

出院了，我的小病人“傍”上“读书哥”

我挨个打电话，劝病人都先别来了

如果我们冒险救一个病人，使很多病人、医护人员面对暴露风险，甚至使她们被感染，那就不是关停病房，而是关闭医院了

口述：张玲 | 34岁 | 医生 | 北京
整理：尹平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荒

我是北京一家三甲医院肿瘤内科的医生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与一线抗疫科室的医护人员相比，我们突然闲下来了。现在一周只上两三天班，因为门诊量减半了，病房能关的都关了，不需要这么多大夫天天盯在那儿。上班下班、进出出的，也不利于疫情防控。我们几乎是挨个打电话，劝复诊和定期治疗的病人先别来了——我们的病人是肿瘤患者，绝对对高危易感的特殊人群。给病人注射化疗药，是我们肿瘤内科的常规治疗方式。药打完以后这段时间，病人大多都经历一个免疫抑制的阶段，药物作用会使免疫力低下。哪怕只是普通感冒，或者拉肚子等小毛病，对他们来说，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，更别说新冠病毒了。现在我们提倡营养均衡，还要吃好、睡好，多休息，才能提高免疫力，抵抗病毒侵袭。但打完化疗药的肿瘤患者，因药物作用造成的免疫力下降，靠吃好睡好是补不上来的。这种情况下，万一肿瘤患者感染新冠肺炎，重症和危重症率会很高，可能很快就发展成重症病人。还有关停住院病房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一般的住院病房，房间里有4到6张床。如果再加上陪护、探视，还有来回走动的医护人员，你数数得有多少人？有一个人感染发病，连带的可就是几十人。所以，除了年前做手术仍需住院治疗的病人，一般不是危重状况的病人都出院了。现在很多科室的病房都关停了。说实话，我们心里也很矛盾。治吧，万一互相感染了，有可能迅速致命；不治吧，我们毕竟是医生，心里总觉得不是个事儿。对于那些早期的肿瘤患者，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，就容易造成病情延误；而已经确诊的癌症晚期病人，让人家等三个月再做化疗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劝返病人这样的事，我们也觉得很难张口。在这种特殊时期，肿瘤患者的确很可怜，非常值得同情。可是，万一因为同情某个病人，接收他入院治疗，由此带来新冠肺炎病毒，责任可就大了。如果我们冒险救一个病人，使很多病人、医护人员面对暴露风险，甚至有可能使她们被感染，最后导致疫情大面积暴发，那就不是关停病房，而是关闭医院了。但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除了因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外，疫情导致其他疾病延误治疗而出现这样后果的，应该比平时要高。面对一些病人的无助，我也很难过。但作为医生要具有冷静理智的判断能力，不能被太多情绪的东西所掌控。这种心理素质也是职业素养的一部分。我们劝返外地的病人，相对比较顺利。毕竟来北京看病跑一趟，风险和成本都不小。先不说旅途上的防疫风险，就算顺利到北京来放化疗，现在很多小区都封闭了，能不能租到地方住都成问题。劝返北京当地的病人，往往阻力会比较大。他们会说自己并没有离开过北京，家里也没有外地来的亲戚。至于对方到底有没有接触过史，估计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建议病人在家附近的医院就近治疗。但他们有人一开始就到我们医院就诊，信任我们大夫。病人坚持要来，我们还是照旧接诊。我现在每周出一天门诊，出诊时并不太担心，因为都做好防护了。我们的防护是有明确规则的：进到什么地方，做哪个级别的工作，防护标准和装备相应地达到几级。这是前人留下来的经验，按规定做就可以了。令人安心的是，现在病人的防护意识也很强。自疫情暴发以来，病人来诊室没有一个不戴口罩的，绝大部分都戴N95口罩。我只见过一个戴普通口罩的，还戴了双层。我们通过接诊病人被传染到的可能性，也是微乎其微。现在病人都很自觉，不会轻易摘下口罩。大家都戴着口罩，交流可能说不清楚或听不清楚。但没有病人自己摘下口罩，或提出说摘下口罩的要求。我们现在每周只上两三天班，不先适应疫情防控升级，还可以节约防护用品。如果每天全员上班，又没有多少病人诊疗，岂不是白白消耗帽子、口罩和手套吗？现在口罩都锁在保险柜里了，上班的医护人员按人头签字领取。前两年为了防雾霾，我跟邻居团买了一大箱N95口罩。随着北京空气质量改善，一直没怎么派上用场。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人用，家人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就可以了。我捐了一些给去湖北支援的同事，还有各地呼吸科一线的同学。女儿快两岁了。我们一家三口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。现在疫情防控要求严，比起劝动病人，劝动女儿更难。她整天一门心思要出去玩，念念不忘坐滑梯、荡秋千、滑滑梯什么的。我每天都要跟她讲：“现在外面有个很危险的大病毒，你出去玩碰上它就会生病，还得打针，特别特别可怕。咱们不要出去了。”这两天，她终于听进去了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张玲为化名）

口述：张佳丽 | 26岁 | 护士 | 贵州贵阳
整理：向定杰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梦妮

我想自己多一些问候，或许能在这个密闭的空间，给予他们更多安慰。慢慢地，大家熟悉起来，病人们也开始改变沮丧的心情，主动要求下床活动、锻炼身体

2月7日，作为一名护士，我第一次进入武汉江汉方舱医院。这里和传统医院差别太大了，满眼都是密密麻麻的患者。印象最深的是听到一个孕妇过度紧张地说，感觉自己到了病毒堆，连呼吸都怕有错。我接管的二三十个病人，年龄最小的是个男孩，只有15岁；年纪最大的是他爷爷，已经73岁了。男孩是单亲，他们一家共4口人。疫情暴发后，奶奶感染重症去世，妈妈在方舱里的另一个区。前段时间，孩子快要出院了。妈妈和爷爷还不能出院。大家都在担心，孩子出去了没人照顾。这时，旁边有一位小伙子，说他也快出院了。到时候，可以帮忙照顾这个小朋友。原来，这位热心肠的小伙子，就是前不久走红网络的方舱“读书哥”——这位留美的博士后戴着口罩，在方舱病床上安静阅读的照片，在网上刷屏了。连他读的那本书，听说都成了畅销书。后来，这位“读书哥”真带着这个15岁孩子一起出院了。听说，方舱内图书驿站的建立，就跟“读书哥”有关。现在，病人随时都能去那里拿书看，可以打发不少时间。在方舱，我第一次穿戴上防护用品。一开始很不习惯，遇上天气好、温度高的时候，真

特别火。后来已经不鼓励跳了，改为打太极拳之类舒缓的活动了——据说，跳广场舞容易引起灰尘和飞沫。在我负责的病人中，有一位患有糖尿病。每一餐，我都会提醒他吃什么、不吃什么，多吃什么、少吃什么。没想到，我的用心被他记在心上。2月19日，我除了收到所护理病人的联名感谢信外，还有一封是他单独写的。这些都让我觉得，出征武汉并没有那么苦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这段时间，社会各界对我们的关爱也很多。武汉这边发了很多生活用品，家乡贵州又寄了几批过来。爱心礼包里面，除了羽绒服、鞋子，连辣子鸡都有。吃着家乡的辣子鸡，我也有点想家了。我至今仍清楚记得，离家之前的那几个小时。2月4日半夜，我正在息烽县中医医院值班，护士长打来一个电话。她说，医院有个援助武汉的名额，问我是否愿意去。“愿意！”我立马回答。但也许我决定得太快，反而引起了护士长的担忧。她又追问：“你确定要去吗？会很辛苦的，你能不能坚持？”想到自己没结婚、没孩子，况且国难当头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。为了表达内心的坚决，我对护士长讲：“不要再说了，我去。”在做决定的过程中，我心跳有些加速。放下电话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。我有些害怕告诉家人这个决定，怕他们担心。1个小时后，我回家收拾行李。尽管很小

心，但还是惊动了父母和爷爷。他们知道我要去武汉增援的事，可能是怕我乱了阵脚，都表现得很淡定。83岁的爷爷还说，去吧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！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。我们一家人在火炉面前，坐到了天微亮。大家聊了什么时候走、要带哪些东西、医院去几个人等等之后，便不敢延伸这个话题了。我一边逗我的小侄儿，一边和家人谈着以前家里的事儿，就这样度过了在家的最后两三个小时。清晨六点，带着匆忙收拾的行李，我返回医院。下午2点，我在贵阳机场，与贵州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101名成员汇合，一起飞往武汉。到了武汉，大巴车开进市区，偌大的城市竟然空荡荡的，几十层的高楼就那么几处灯光，大家都有些紧张。第二天开会时，同行的一位小哥哥，用胶布把窗户透风的地方都封了起来。经过两天的培训，我们渐渐消除了一些恐惧，也学习了怎么和病人沟通，以及防护用品的选择及穿戴。进入方舱后，我的任务主要是为病人测体温、脉搏、血压、血氧饱和度，并做好记录。此外，病人生活也是我们负责，比如发盒饭、牛奶、水果。转眼到了2月下旬，贵州医疗队管理的患者开始陆续出院。其中，也有我护理的患者，包括跟着“读书哥”一起离开的小男生。看着病人们纷纷康复出院，我觉得我也快回家了呢！



▲2月17日，在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，医务人员在为患者做检查。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临走前，家人把所有口罩都塞给了我

口述：陈晓涵 | 24岁 | 护士 | 湖北荆州
整理：刘梦妮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刘荒

“要是你真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……”虽然告别时匆匆忙忙，我俩都有意回避对方的目光，但听得出来我爸哭了。这是我二十多年来，第一次见他哭

我是荆州市区一家妇幼医院的护士。1月23日，上完春节前最后一个夜班，我赶早坐上了回老家镇上的大巴。尽管武汉的疫情已经蔓延开了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家过年，心情还是比较轻松的。大巴车上，满车人都戴着口罩，有人甚至戴了两个。很多人都在刷微信或语音聊天，有的嘱咐对方要多买口罩，有的抱怨跑了好多地方都买不到口罩了……“武汉很多医护人员因感染被隔离……医院病人爆满，很多人住不了院……”突然，不知谁的微信播放出一段语音，声音急切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停止说话，安静地听着这段话，好像都听出话里流露出的恐惧。大家不约而同地保持着沉默，我的心也开始沉重起来——不知道武汉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，会不会影响我们过春节。到了老家镇上下车后，我先去了大伯家，他们早已做好饭菜等我呢。吃完饭，我想去看堂姐，大伯大妈不让去，说堂姐夫前几天刚从武汉回来，他们一家人已经自我隔离了。给堂姐发微信，说我到老家了，她回我说，“我们不安全”，并嘱咐我这段时间别去找他们玩。

大伯直接开车送我回家。一路上，本该喧闹的街道冷冷清清，几乎没什么人出门乱跑。到家后，爸妈和奶奶看到我都很开心。因为上大夜班一夜没睡，早上又坐大巴往老家赶，我开始犯困了。简单跟他们聊了几句，就上楼补觉去了。睡梦中，我被同事打来的电话惊醒。她有些紧张不安地问我，有没有看微信群里的信息，并提醒看到后赶紧回复。一瞬间，我睡意全无。原来是院里要求全体医护人员登记信息，离开荆州的要全部登记去处，随时待命，无特殊情况不得离荆。我这时真正感觉到了疫情的严重性，开始在手机上查看有关疫情的最新报道。晚上和爸爸聊天，他说自己长这么大，头

一回听说武汉封城，肯定疫情很严重。电视上，已有医护人员主动请缨支援。爸爸转头对我说，明天还是回去上班吧，你是护士，这时候如果专业的人都不行动，那国家该怎么办……“你是护士……”，后面的话都被我自动屏蔽了。我很害怕，也很委屈。爸爸的心肠太硬了，怎么可以无私到不要女儿了？我一个人回卧室悄悄地哭了。那一晚，我失眠了。一边不停地查看疫情新闻，一边想象着自己被感染在医院抢救的情形，甚至想到死了的样子。第二天是大年三十。早上醒来，窗外能听到零星的鞭炮声，我却提不起半点兴致了。爸爸喊我早点吃饭，找车送我回医院，怕晚了大过年的，不好找车了。单位要求登记去处，随时待命，到爸爸这儿变成了立即回院工作。我们在荆州又不是武汉，吃完年夜饭明天再走不行吗？我一肚子的难过和委屈，却又不想说出来。临走之前，他把家里所有的口罩都塞给我，让我都带着。还说家里人反正不出门，用不着，让我保护好自己。送我上车时，爸爸又叮嘱我，回去有空就给家里报平安，一定照顾好自己。“要是你真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……”虽然告别时匆匆忙忙，我俩都有意回避对方的目光，但听得出来我爸

哭了。这是我二十多年来，第一次见他哭。我回到医院到岗上班。几天后，我们医院成为接收新冠肺炎确诊孕妇的定点医院。我瞒着家里人，报名去了隔离区，护理确诊孕妇生下的宝宝。大家在一起工作，好像就没那么怕了，忙碌中，也没时间去想那些害怕的事。一个在武汉工作的同学，有句话对我特别受用：恐惧都是因为未知。多看关于新冠病毒的科普文章和视频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。休息的时候，我把新冠肺炎、埃博拉、天花、流感、鼠疫等传染病的相关科普文章和视频，凡是在网上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。我们要做好防护，尽量不外出，吃好睡好，增强身体抵抗力，光害怕是没有用的。离开老家后，湖北疫情一直在加重，家人都在担心我。有一次，妈妈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上班没接到，她就很着急打给我爸，问我在荆州的情况，直到知道我一切平安。我堂姐也时不时微信我说，医院里面人多，现在家里最危险的就是我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做好防护……他们至今都不知道，我已经在隔离病房工作多日了。回家的高速公路已经封了。估计得等到疫情彻底结束，我才能见到家人了吧。最让人开心的是，隔离病房的两个宝宝，两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，这也给了我更多的信心与安慰。（应受访者要求，陈晓涵为化名）